

# 论新闻工作者的学者化<sup>\*</sup>

赵振祥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 361005)

如何提高新闻传播的文化品味,这是目前许多新闻媒介面临的课题。本文拟从新闻工作者应力求学者化这一角度出发,谈一点对这一问题的浅见。

## 一、目前新闻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提高新闻传播的文化品味,这个问题不仅是时下新闻从业人员议论的话题,也是广大读者和观众所关注的焦点。现在的新闻传播媒介作为一种信息源,受众不仅要求它反应快速,信息真实,同时对信息的品味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既是受众文化素质提高的结果,也是新闻传播发展的必然取向。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迅速,新闻传播的设备以及与之相连带的时效性上都有了很大改观,但也必须看到,就在媒介纷纷斥巨资进行硬件建设以及强调新闻报道的快速反应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浮躁的倾向,这就是新闻工作者们在“客观”、“真实”、“通俗”、“快捷”等等机械训条的训斥下,已经成了新闻事实简单的传声筒,新闻传播越来越趋于现象化、浅表化及至庸俗化,缺乏一种文化的厚重。许多记者除了撰写“本报讯”之外,一无所能,不会写深度报道,不会写言论。以言论为例,言论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报纸中,言论不仅具有总领版面和活跃版面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体现着报纸的格调,体现着整个报纸的文化品味。而从现在报社的情况看,许多报社的编辑部尤其是一些地市级的报社既缺乏足量的言论稿件,也缺乏高水平的言论撰稿人。有些言论稿件即使勉强成篇,也多是就事论事,缺乏较强的文化内涵,稿件的信息含量也随之降低,读来枯燥无味。这几年许多报纸为了适应读者的要求,开办了一些文化专版等,旨在提高媒

介自身的文化品味,但由于缺乏高水平的撰稿人和稿件的匮乏,这些专版办得普遍让人感到“没文化”。一些电视台和电台也应时开办了一些文化直播版块、文化专题节目等,同样也是由于撰稿人和节目主持人缺乏较深厚的文化功底,结果节目办得既平白又吃力,难以吸引观众。

新闻工作者队伍这种缺乏文化淬炼的现象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在新闻传播大爆炸的今天,电视、电台和报纸等各种大众媒介对受众形成了天罗地网般的包围圈,一齐轰击无法躲避的受众。加拿大大众传播研究人员 M. 麦克鲁汉 (Marshall McLuhan) 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曾提出过“*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意即“媒介即按摩”,“按摩”在这里带有“麻醉”的意思(转引自居延安《信息·沟通·传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3 月版)。这一定义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了媒介对受众的作用——就象麻醉药品对于患者既可发挥有益作用也可发挥有害作用一样,媒介对于受众也是一种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的麻醉,这种作用是有益还是有害完全决定于媒介的文化品味,而媒介的文化品味又是直接决定于新闻工作者的文化素质。以媒介对书籍的介绍为例,现在无论是在报纸还是广播电视,都设有一些推荐介绍新书的栏目,许多新版书籍凭借新闻媒介的翅膀很快被推向了市场,这些书籍上也附载了新闻媒介的信誉。但由于一些推荐介绍新书的记者专业知识匮乏,对于该书所涉及的领域不甚了解,或者对该书的学术地位缺乏准确的定位,却妄加一些誉美之词,从而给读者心中造成了混乱,尤其是一些年轻的读者,他们会感到无所适从。如果所推介的书品位不高但由于被冠上了一些超乎所值的名号而被读者所认可的话,那么这里新闻媒介的所为就

\* 收稿日期 1999-06-20

不啻是对读者的一种有害的文化麻醉。关于这一问题现在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严重关注,他们痛斥时下是“记者评书而不是学者评书”。这里他们把“记者”与“学者”对立起来,无疑是在批评一些记者的无学,而不在于记者该不该评书。记者的这种“乱弹琴”现象在学术界和文学艺术界都有所存在,有人便明确指出:“文艺界的某些混乱和个别新闻报道不准确是有关联的。乱用‘家’‘风格’‘代’等较为严格的定性语,剔除有些不良因素作怪等原因,主要是因为个别新闻工作者知识不够博,素养相对较差。所谓风格应该是对一种艺术具有全方位的成体系的创新,且这种体系应具有价值,这样才能称家。当记者的既没有这样基本的认识素养而又不了解专业的,随便人云亦云也就难免了。”(《金文学·记者·知识·素养》,《新闻与写作》1997年6期)。新闻媒介具有强大的宣传性和舆论导向作用,记者一言九鼎,一旦出现误导,其恶劣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 二、学有专长乃是新闻工作者的传统

根究起来,新闻工作者的这种素质状况应当说首先与新闻单位用人的取向有很大关系。目前有些新闻单位已明确表示,在对毕业生的选用上更倾向于录用本科生和一些硕士生,而对博士生则不感兴趣,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本科生年轻手快、能跑能写,而博士生似乎派不上太大的用场,却还要给他相应的待遇。被录用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们进单位后听到的最多的教诲也是让他们努力做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去抓新闻而不是督促他们去学习。新闻单位的这种“短期意识”培养出来的记者确实什么都懂一些,但浮浅也同时成了许多记者的通病,加之他们站在“居高声自远”的位置上,便往往养成了喜欢大言欺人的毛病。

其实努力做一个“专家”或者说学者型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直是老一代新闻工作者们所提倡的,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传统,马克思与恩格斯是最早的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他们一生的革命活动是与报刊工作密不可分的,在他们经典著作中有许多关于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精辟论述,其中就不乏关于新闻工作者丰富知识、学做专家的论述。1847年9月,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卡·海因岑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文章,攻击共产主义者及其理论。为回击他,恩格斯写了一组文章,其中一篇在论述党的政论家所应具备的素质时便说:“就海因岑先生现在具有的和多年经验证明他能够具有的各方面的条件来说,党的政论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

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304页)。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提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论家,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他在1854年3月30日写给《每日新闻》编辑赫·林肯自荐做该报军事专栏撰稿人的信中说:“选用军事专栏的撰稿人,‘主要问题在于撰稿人是否真正内行。’为了向林肯证明自己具有出色的军事专业知识,恩格斯在信中提出将向林肯提供一系列自己撰写的各种军事论文,这些论文‘可以让任何一个军事问题权威加以审阅’。同时还在信中介绍自己‘曾在普鲁士炮兵里受过军事教育’,‘后来,我又亲自参加了1849年南德意志起义战争时期的战斗活动。多年来,对军事科学的一切部门进行研究已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607—610页)。恩格斯的这封自荐信并没有夸大的成份,他在军事方面的知识和见识确实是非常出色的,他在克里木战争期间(1853—1856)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系列关于战争的通讯,在1870年7月至1871年2月,恩格斯又为英国保守派的《派尔—麦尔新闻》撰写了关于普法战争进程的42篇战争短评,等等。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用开玩笑的语调称赞他说:“如果战争(指普法战争—引者)再延续一些时候,那你很快会被公认为伦敦的头号军事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239页)

主张新闻工作者应当学者化,这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所提倡的,也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在我国报业发展史上,向来有“学者办报”的传统。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期是我国报业发展初期出现的一个报业发展高潮,由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维新派把办报刊作为他们开展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创办了许多有影响的报纸和刊物,这些维新分子中有许多都是学术史上著名的学者,象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他们办的报刊有在北京出版的《万国公报》(出了45号之后改组出版为《中外纪闻》)、在上海出版的《强学报》和《时务报》,在澳门出版的《知新报》等等,为变法维新鼓与呼。1897年10月,著名思想家严复与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严复译的《天演论》一部分就是在这张报纸上刊发的。在杭州则有章炳麟等编辑出版的《经世报》等等。这些著名的报人既是知名的学者,又都是著名的政论家,学论相长,使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到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过《晨钟报》和《每周评论》总编辑的李大钊以及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的鲁迅、胡适,主办过《公理日报》

的叶圣陶和郑振铎等等都是一些著名的学者,他们用他们雄厚的学识支持了中国报业的发展。这其中象鲁迅先生,他起的作用尤为瞩目。鲁迅先生对报业的主要贡献是他创作了大量的杂文,鲁迅先生渊博的学识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研,使他的杂文充满了老辣厚重的韵味,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因此他的杂文发表在哪家报纸上,哪家报纸就成为读者关注的对象。北京的《晨报》曾于1921年12月开办了一张半独立的《晨报副镌》,《晨报》这张报纸虽然在政治上是向后退的,但又不得不在思想文化上保持一种进步的姿态,这就是办《晨报副镌》的初衷。就是在这张副刊上,鲁迅先生发表了许多杂文以及小说《阿Q正传》等作品,以至“在一张政治上逐渐变得并无可取的报纸上,副镌却光芒四射地吸引着人们的重视。”(李龙牧《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此外,鲁迅所支持的报刊还有《语丝》、《晨报副刊》、《申报》的《自由谈》以及鲁迅亲自主持创办的《莽原》周刊等,这些都成了当时极具战斗力的报刊。

### 三、关于学者化与大众化的关系问题

谈到学者化,人们也许会联想到吊书袋、联想到艰深古奥的学问,这些东西似乎恰恰是新闻工作者应避免的。加上新闻界行外一些人甚至包括新闻界的一些行内人士本来就对新闻工作以及新闻研究以“无学”侧视之,新闻工作者似乎与学问就越发的不沾边了。新闻传播是主要以新闻事实为内容的,从这一点来说,新闻工作者追求的是对事实非常具体的写真。但必须看到,任何一个新闻工作者,如果他只是象摄像机一样机械地反映客观事实,他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好新闻工作者的。新闻工作者在新闻追求之上还有一种理性的追求,艾丰在《经济述评自析集》中便谈到这一问题:“用事实去参与理论,必须走过一座桥:从事实中抽象出理论观点,摆事实,还要讲道理。”新闻事实只是一些材料,建构在这些材料之上的理性追求才是新闻工作者最广阔的追求,而这种理性的追求是非济之以学理不能完成的。“学者化”不仅指新闻工作者在某一专业上应成为内行,同时也指新闻工作者应具有学术的、理论的思维能力,用这种“学者化”的深邃的目光去观照、提炼新闻

事实,必然会使新闻传播更具一种理性的深度。

因此可以说,我们提倡新闻工作者应当“学者化”,根本的目的是要使新闻传播插上理性的翅膀,而不是要让新闻传播背上一个“吊书袋”的恶谥。这与新闻传播的大众性并不矛盾。大众性等于是浅显并不等于浅薄,等于通俗并不等于鄙俗,因此新闻工作者的“学者化”与新闻传播的大众性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其实在我国报业伊始,那些办报的著名学者们就是积极主张报纸大众化、反对“吊书袋”的。1899年维新派在澳门办的《知新报》就发表过陈荣衮的文章《论报章宜改用浅说》,批判文言,提倡白话。严复在《国闻报缘起》中说:“阅报之人亦略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多为,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多为,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所谓“旬报”即今天所说的杂志类。这些办报的学者们正在努力兼顾士大夫读书人和普通人的要求,率先从语言上进行改革。蔡元培等人办的《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非常注意通俗宣传,每日发白话文与文言文各一篇;新文化运动以后,《新青年》、《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报纸用白话文论学论政,这些作者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鲁迅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型的报人和文化人。他们提倡报刊使用通俗化的语言,内容上也要努力靠近民众,但这一切并没有削弱新闻作品的理性深度,从这些报刊所领导的一个又一个的思想文化运动就可以完全证明这一点。

提倡新闻工作者走学者化的道路,这本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由于一段时间尤其是文革十年极“左”思潮的影响,伴随着“为工农兵服务”口号的越喊越响和知识分子地位的每况愈下,“学者”、“学术”这些词都成了垃圾,自然也就不可能谈什么新闻工作者的学者化了,新闻传播也更堕落得谈不上什么文化品味和理性追求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艺术自然也包括新闻传播的欣赏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新闻队伍也必须相应地跟上受众的这种变化,提高自身的素质。这不仅是新闻传播发展的必然取向,也是新闻业竞争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 陈松柏)